

两个“发小”的北京生活

7

社会实录



廉思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

【上期回顾】

欺骗这些“蚁族”的，可能有公司，可能有女友，也可能是两者都有……

狄群，男，1984年生，山西运城人。2007年毕业于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学的是经济，属于军校的地方生。毕业后先是在百度公司做销售，现在国贸一家公司做手机系统编程。

邓锬，男，1984年生，山西运城人。2007年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做过医疗器械销售，与自主创业的同学一起做过公司，被传销组织骗过，2008年末为了爱情来到北京，现供职于中关村软件园。

2000年中考之后，成绩本来不错的狄群没考上省重点，回到了县里的高中。

上初中的时候，同学跟他说：“三年爬华山，运气翻一番。”为了考上省重点，他们就每年都乘三个多小时的车从运城去陕西。夜里爬山，每个人手里拿一根荧光棒，从山底到山顶，微弱的光连成一线，狄群他们就跟着这道光线一步一步缩短着与顶峰的距离。待到荧光棒的光芒被天光吞噬，他们刚好站在山顶，眺望从天边喷薄而出的朝阳。那个时候，少年狄群意气风发，壮志在胸。三年后，同学运气果然翻了，狄群却没翻成。从那以后，他再没有爬过华山。

2009年3月28日，当狄群站在唐家岭出租房的楼顶上，在明媚的阳光下回想起这些，已经又是8年多过去了。

这是狄群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爬上唐家岭出租房的楼顶。此时的狄群，大学毕业已近两年，在国贸一家公司做手机系统编程的工作。毕业之后就住进唐家岭，他目睹了这里由一个村庄变成现在出租房林立的模样。

在这里住了两年，狭窄的楼道，阴暗的房间，到处都是压抑的色调，他从来没有想到在顶楼的天台上还有这般灿烂的阳光。站在这阳光下，鸟瞰唐家岭，远远近近的出租房房顶上，一面面五星红旗记载了那些建筑诞生的历史。他脚下的这栋房子，国

旗的颜色已经暗淡，边上撕出了条子，可在去年，这里还是一所幼儿园。今天，他就要永远离开唐家岭，不再回来。

楼下310房间里，地上、床上到处都堆放着塞满了的袋子箱子，杂物被随手扔在地上，进门都不知如何下脚。墙边，一个大的芬达饮料瓶子里装了半瓶水，里面插着一枝已经变成黑红色的玫瑰。邓锬一边在等狄群的女朋友回来，一边在网上研究“红烧鸡块”的做法。这是他们在唐家岭“最后的午餐”，两人决定做得丰盛一些。

狄群和邓锬，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算是“发小”。父母们都是山西运城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工，在那儿，“几乎所有的人都互相认识”。他们上的是同一所小学、同一所高中，大学毕业后租住在唐家岭，邓锬把自己房间的钥匙给狄群一把，平日常，邓锬做饭，狄群洗碗，开心了一起聊天分享，郁闷了一起借酒浇愁。狄群下班回来刚走到一楼，住在三楼的邓锬就能听出来是他。

2003年高考结束后没多久，他们在一起打牌时得知了分数。于是，狄群北上北京，邓锬南下昆明，狄群学经济，邓锬学生物医学工程。

（狄群自述）2007年毕业了，我俩一起找工作。刚开始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们的学校不是重点大学，就胡找呗。

我大学学的是经济，当初高考报志愿，家里人也不知哪个专业好，只是经常看中央二台经济频道，觉得经济挺好，当时也挺火，就报了这个专业，也不知道出来能干啥。后来找工作，学的东西用不上，只能做销售。跑了几趟招聘会，百度正好招应届毕业生，我就去了。那个工作太累了，就是一天去了狂打电话，拿着客户资料一个一个打，一天能打两三百个电话。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中午休息一小时，下班后还得加班找资料挖掘新客

户。周而复始。感觉特别枯燥，工作压力很大，那时候连吃饭都愁眉苦脸。谁都可以做，用不着上大学都做得了。工资底薪一千多，要特别辛苦才能赚到两三千，也没什么提升空间。

我就想转行。第二年四月，我辞了百度的工作，以为带着一个大公司的工作经验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但发现自己什么都干不了，还赶上又一年新的毕业生出来了。后来听了一个同学的话，我交了一万多报了个班，学诺基亚手机系统编程。十一月份学出来，我找到了工作，在国贸一家外企，签了五年的合同，工资也不高，老板说我没有经验，英语不是很好。好在总算有了工作，谁还计较那么多，也算积累点工作经验呗。

我有个同学考研期间住在唐家岭。于是，我毕业之后也过来了，这边房租便宜，三四百块钱一个单间，带独立卫浴的那种是五六百，啥条件的我都住过。

这儿每个月都有拦路收水费（保护费）的，10块钱一张水票，买了，一个月便得安生。

（邓锬自述）我来北京是为了女朋友。她是我的小学同学，后来他们举家搬到了北京，十几年没见。我找她的联系方式找了两年。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了联系，慢慢就好上了，天天打电话发短消息。有一次，我打算来北京看她，当时我的同学把他们所有的奖学金都给我，一共三千多吧。票都买好了，却赶上物理期中考试，没去成。后来我提出了分手。我知道这一次伤她很深，但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分手的理由。

毕业后，我来北京找工作。2007年7月27日，她无意中给我打了个电话，正好是我来北京的第一天。八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才一起吃了个饭，然后再没了联系。

跑了一个月的招聘会之后，8月

23日，我开始在某医院的一个医疗器械中心上班。做到27日，我拿到了第一份工资，323元。

10月中有一天，一个云南的同学搞错了号码，打到了我这里来，我们干脆聊起来，他说他在广州做医疗器械维护，一个月两千多块钱。当时正赶上广交会，他说公司比较忙，缺人手，叫我也过去做。他说不要跟别人说，机会有限，怕别人知道了都来找他。这个理由我也理解，于是就说我去。他催得很急，要我周末就赶过去。但我走之前还是留了个心眼，跟狄群说好，如果我打电话回来“这儿很好，你也来吧”，那就说明我被传销组织骗了，让他马上报警。

从广州火车站出来，同学和另外一个当过兵的人把我带到了去东莞的长途汽车。他们把我带到了了一个三层的小楼，一进去我就知道，肯定是搞传销的，遇到这种情况，反抗越激烈，越是走不了，于是我就表现得挺顺从。

狄群跟我说，他有一个哥们儿进了传销组织，在里面呆了半个月，说动了三个人跟他一起跑了。我当时就想，反正我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就跟他们较量较量。其实人都是这样，只要你懂得比他们多，他们认为你有本事，就会听你的。最后他们没把我说服，倒是被我劝动了。

后来主任便不让我多说话，换成了经理级以上的人来教育我。

我刚来的时候给狄群打电话，他没有接到，后来他再给我打，没人接，他就急了，发短信说“赶紧给我回话，再不回话我就报警了”。因为他们拿走了我的手机，会以我的口吻给我的朋友发短信。他们给狄群回短信说：“你不要着急，我的手机费了。”狄群说：“你放屁，他手机里有多少钱我还能不知道啊？你根本就不是邓锬，如果你是，我问你，我女朋友叫什么名字？”这边的人答不上来，就没敢再回消息。

把自己交给电影

5

畅销读物

《我和电影的二三事》

说到电影跟怀旧，要跟大家介绍一本好书，叫做《我和电影的二三事》，是几年前香港电影评论协会出版的一本书。

香港电影评论协会由一帮香港的影评人组成，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二十多岁，都是影评写得相对比较专业的一群人。过去几十年来，香港曾经是整个华人世界资讯最发达、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这批香港影评人有更好的基础吸收各国的电影，很多大师的杰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机会看到了。

看大师的电影有时会出现很多意外，比如著名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他的《blow up》，我们译为《放大》，而当年在香港被翻译为《春光乍现》，这完全没办法表达这个电影的意思，甚至不能被称为直译。对此，书里的影评人何思颖说，当年这么翻译其实是合理的，因为《春光乍现》1967年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很多电影人或者电影院线的老板都觉得这部电影最轰动的地方在于里面有一秒一个女性正面全裸镜头，所以就因为这一秒，把这部艺术电影改了一个带点色情意味的片名，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果然就有无数中老年男性观众抢着去看，为的就是那一秒的色情镜头，而一秒很可能打个哈欠就过去了，万一错过一定会觉得很受苦，因为这部电影对大部分人来说太沉闷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发条橘子》也有同感。当时已经是录影带阶段了，电影里有一个快速的片段是关于做爱的，我们一群人拿着录影机，拼命地按来按去，希望能够一步一步一格一格地重播这个片段，为的是看清楚那一点可怜的做爱场面。

李卓陶是我很喜欢的影评人，他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香港看电影的情况。当时电影院都有星期天早场，平常播的都是主流电影，但到了星期天早上会放一些比较冷门的偏艺术的电影，或是一些旧日的经典电影。这对于我们这些没接触过那些电影，只在文字上看到或者听说过的人而言当然重要，于是星期天总是起个大早，像朝圣一样去看电影。李卓陶说：“当时只有饥渴的影迷才会在星期天一早爬起来看10点半，像朝圣又像补课。维斯康蒂、安东尼奥尼、杜鲁弗都是那时候在这些主流院线的星期天早场补回来的。”当年大家有机会看到的电影比今天少得多，现如今我们都有碟，而且盗版碟到处都是，几乎你要看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今天可能会觉得这些大师名作并不稀奇，但对以前的人来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放的时候没看你会觉得以后恐怕再没机会看了。

另一位影评人李陶则说：“当年大家有一句广东话，意思就是如果不看就不用再想以后还能看了，在这样的心情下，我们每次看电影看电影时就有生离死别的感觉，从小就不把看电影当成娱乐。比如说看《教父》、《大闹天宫》、《地狱变》、《罗马》或是伯格曼的《第七封印》，都是这个感觉。”

以前电影院里是能抽烟的，记得那段日子我们在电影院里吞云吐雾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这当然很讨厌，让整个电影院变成纳粹毒气室一般，可它又有一种独特的氛围。书里留学法国的影评人黄爱玲说她第一次看到法国有名的儿童电影《红气球》，是在巴黎大学里一个专门给学生看电影的电影厅，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法国学生里烟民甚多，个个都像火车头，几乎把课堂变成了毒气间。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仍然深深地爱着电影，甚至是爱上了电影。

香港电影学者、影评人尤静，同时也是电影导演，她在这本书里写了一篇文章，叫《电影病》，就把何谓“爱

上”做了个解释：“我说爱上，不是爱，爱电影很容易，就像吃一碗拉面，吃过就算了，下次吃意大利面都能爱。但是爱而且是上了，就比较难脱身，即使不是一辈子的事，也是很长的首尾。……我爱上了电影二十多年，其实不止是这个电影片段本身，而是很珍重那种电影院的感觉，跟今天看电视完全不一样。当年看电影你觉得自己有一种勇气的爆发，因为你能够看到那么多大师名作。看到那些很具颠覆性的电影时你会觉得这些人这么勇敢，连这样的东西都拍出来了，做观众又怎么能害怕呢？”

我们每一个人在看电影的时候都等于在交心，我们是被动的，没有办法用遥控器把它按停，这时候的我们完全放弃了主权，把自己交给了电影，这难道不是一件很需要勇气、很像爱情的事吗？

《切·格瓦拉之死》

一个年轻人应该要有改变世界的热血，要有远大的理想，社会主义完全能够代表这一切。但是如果他到了一定岁数，知道了人生中各种各样所不能够推卸的责任之后，他仍然相信这些价值，那他就是——一个傻瓜了。

这句话在最近30年的西方世界变得特别流行，它其实表达的是一种集体的虚无感，这种虚无感是整整一代人。怎么样去把握和认识这样一种幻灭感，给大家介绍一本《切·格瓦拉之死》。我看的是中国台湾版，中国大陆版很早就出来了，作者叫杰伊·坎特，是一个美国的文学教授，现在在波士顿大学教书。杰伊·坎特本身除了是个教授之外还是个挺不错的作家，这本书是他的第一本小说，而且这本书的翻译者也非常值得介绍，叫周雅，我觉得这本书译得相当好，600多页的巨著。这样一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出来的时候曾经得过好评，但后来被人

淡忘了，直到这几年因为切·格瓦拉热又回头，很多人才把它重新拿起来看。

关于切·格瓦拉，描写他的小说、传记、纪录片、电影、漫画卡通实在是太多了，因为他是个神话般的人物，他能够提供很多创作的灵感和题材，所以很多人以他为主人公写小说。但是这本小说在当年出来的时候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它简直有点像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文笔近乎一种巴罗克式的精雕细琢，而且最特别的地方是他的观点。

这本书主要想表达的中心观点是切·格瓦拉是一个时代之中的悲剧人物，他有远大的理想，但是他失败了，而且今天去看甚至有点可笑。我们看看这本书里怎样描述他的失败，“他觉得自己很擅长演讲，在玻利维亚丛林里面碰到一帮农民，就把他们这个小镇的人叫出来，然后对他们演讲，跟他们说，美国有多坏多坏，结果这帮人听着他说话，就问他说的什么，还问他：你老说北美人很坏，北美人是外星人还是怪兽呢？”也就是说那些人愚昧到不知道什么叫北美人，更不知道什么叫美国人，然后切·格瓦拉就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生产出来的粮食全被他们霸占了。”那些农民就说：“不对呀，这些土地都是我们自个儿的，我们自个儿种，没人霸占。”切·格瓦拉只好再给他们分析：“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这些东西最后只能卖给他们，他们把买家垄断了。”结果那些人听得是一愣一愣的，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切·格瓦拉最终被描写成了一个有理想但是不顾现实，最终导致自己失败的偏执狂。事实上，这也是整整一代西方知识分子集体反省的结果。当年他们都曾经最相信革命，支持切·格瓦拉，崇拜他，但是当现实磨人，有一天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能做到的时候，回过头来就只能嘲讽过去的一切，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中年人，不是吗？



编者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上海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梁文道 我读》是基于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而来的，这个节目通过主持人每天介绍一本书，让观众用最便捷的方式接触到书籍的精髓，进入一个又一个迥异又奇妙的书中世界。这是一本近似于社会时评的文集，作者从某本书出发，引申出对社会、人生等各方面的看法，语调轻松有趣，以说故事为主，启发读者：书可以这样读。

【上期回顾】

或许将来再去电影院了，不知道那时我们会不会怀念今天用影碟看电影的日子。《一个人的电影》这本书，梁文道最喜欢的是开头第一篇格非的文章，这让他怀念起以前放大电影时的时光……